

现代思想 衡虑下 的启蒙理念

胡治洪
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 08JJD720033

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

胡治洪 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胡治洪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307-08807-8

I. 现… II. 胡… III. 启蒙运动—研究—西方国家 IV. 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4005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8.25 字数: 402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807-8/B · 324 定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按正文次序排列)

-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梁治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
-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田文军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李翔海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 单 纯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丁为祥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 龚建平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胡治洪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 范瑞平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行政学系副教授
- 柳向忠 武汉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 姚才刚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 谢远箬 湖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 庞雯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 景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 何卫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陈 来 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
- 甘 阳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授
- 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 卢 风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 姜明琪 (Aglaia Starostina)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 徐 骆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代序：启蒙的吊诡与启蒙的反思

胡治洪

17—18 世纪兴起于西欧北美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启蒙思想家接续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内部所萌蘖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实验科学等异端思潮，进一步高扬理性、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进步等价值理念，对禁锢人们头脑的神学教条和束缚人们身心的王权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乃至猛烈抨击，在观念领域中发生了极大的祛蔽作用和解放效应。启蒙运动不仅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等巨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更为根本的是，它在西方世界中相当广泛地启发了人的自我意识、理性信心、进取精神和权利观念，推动了世俗化和平民化进程，从而通过人的觉醒而导致西方世界在整个人类世界中率先告别古代社会，进入以个体化、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都市化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在发生意义上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启蒙理念，其普世化推扩采取了一条十分吊诡的进路。一方面，基于启蒙理念而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各国，不仅在各自国内为着财富和权力而反复进行阶级之间的斗争，并在西方世界范围内为着领土和资源而反复进行实力的较量，而且凭借其整体上的器物 and 制度优势，将殖民扩张、市场占有率、财富掠取以及列强争夺波及到西方之外几乎所有古老文明地区，由此使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充分感受到现代西方恶的一面，引发了这些古老文明对于现代西方的抵御和反抗。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在与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的剧烈碰撞及其对这些古老文明的胜利征服中，又无往而不表现出现代性的优越，由此使西方之外诸古老

文明日益认识到现代西方富强的一面，引发了这些古老文明对于现代西方的学习和追赶。随着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从被动应激式地仿效现代西方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追求现代化，现代化遂成为从西方到西方之外整个世界的奋斗目标，而作为原生现代化之精神动源的启蒙理念，也就俨然上升为普世性的绝对价值。时至今日，现代化仍然是整个世界（特别是处于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范围内的后发现代化地区）的主要潮流，启蒙理念也仍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话语系统和最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但是，从 18 世纪开始产生的现代社会，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确实为人类开辟了科研机构、工业体系、交通设施、市场建置、金融行业、民主政体、法律系统、大众传媒、公共教育、医疗保健、都市服务等诸多新的利益领域，但也日益暴露出固有或衍生的弊害，甚至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对宗教和传统的祛魅破坏了人类自我约束的根据及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工具理性凸显导致人性的萎缩和社会的市场化，原子式个人主义的高扬引发社群的疏离乃至破毁，极端自由主义盛行致使社会公正无从落实，普遍的怀疑心理和制约动机通过剔除社会政治中的道德因素和信赖感而造成民主的劣质化，作为个人中心主义之放大的族群中心主义激发了层出不穷的国际冲突；最为严重的是，僭妄的工具理性主义，攫取和占有性的个人自由主义，反宗教、反传统、反自然的个人—人类中心主义，在短短三百余年间，便使经亿万万年演化而形成的地球生态系统濒于崩溃，使整个人类面临灭顶之灾！所有这些，引起了当今西方有识之士的深切忧思和强烈批判。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以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全球伦理等思潮渐次兴起，在批判现代社会的同时，更加深入地对工具理性、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权力意志、祛魅观念以及表现为宏大叙事的启蒙主义价值体系进行了质疑和否定，形成一股愈益具有影响力的“启蒙反思”潮流。

“启蒙反思”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诚然兴起于 20 世纪下半叶现代性弊害业已明显暴露的西方，然而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却早在现代化高歌猛进、启蒙价值深入人心的 20 世纪

前期，便已屡见于中国现代思想家（特指那些对于中西文化均具深入体察和深刻洞见，既接受现代西方价值，又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的论说之中，其荦荦大者如：郑观应对强权即公理的国际规则乃至空前残酷的一次大战予以强烈谴责，严复对卢梭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天赋人权论”给予根本否定，康有为鉴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教训而排抵激进民主，梁启超从对自由、科学的鼓吹到中年以后对这类观念表示怀疑和失望，孙中山后期对以西化为旨归的世界主义予以摒弃，章太炎以“俱分进化论”批驳肤浅的直线进步观，蔡元培以专事于现世福利的科学为不足以实现人生价值，辜鸿铭辛辣嘲讽现代西方的最大优势不过是“杀人效率高”，杜亚泉主张以中国固有文明救治被西方现代文明所迷乱的人心，章士钊反对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而力倡“以农立国”，梁漱溟基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理路而断定以意欲向前作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张君勱不仅坚决否认科学万能而且将一战的原因归于科学所引发的人类对于物质利益的无尽追求，熊十力斥责西人始终盘旋于知识论窠臼以至迷失万化大原、人生本性和道德根底，张东荪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贺麟以直觉弥补理性之缺失，金岳霖着眼于现代文明的浑浊而痛感这种文明及其造作者可能将被历史所淘汰；他如王国维、欧阳竟无、太虚乃至青年鲁迅等，也都对启蒙理念和现代性作出了卓有见地的分析与批评。凡此种种论说，或许不如当今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那样切近与系统，但却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在中西古今的宏大视域中对一种强势异质文明的弊害之认识的敏锐性、深刻性和预见性。

长期以来，在以现代化作为至上价值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往往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反动，从而被批判、声讨乃至封杀。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有所转变，但研究者仍多从文化观念的差异或社会政治态度的消极等方面来看待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基本上没有认识到这些审视与批评所具有的“启蒙反思”意义，这样也就忽略了这些审视与批评的思想深度、普适意

义和当下作用。所有这些，不仅有碍于全面、深入、客观、公正地研究和评价这些思想家，而且遮蔽或抛弃了那些可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更为平稳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思资源，当然也更难以向当今世界呈现中国现代思想家在肯定启蒙价值和现代化的前提下对于疗救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弊害所作的超前思考。

时至今日，启蒙价值作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大刀阔斧地砍杀了宗教信仰、传统观念、社会伦范、自然生态之后，日益转向对人类自身的斫伤和毁灭。人生的无望、无根、无安全感、无归属感、无幸福感，几乎弥漫整个世界。而牢笼于启蒙观念之中的世人，由于缺乏改弦易辙的思想资源，只能随顺启蒙运动的惯性，沿着一条不归之路迅跑。当此之时，旨在为人类指点新出路的“启蒙反思”的正当性已经无可争辩。而中国现代思想家的“启蒙反思”论说，不仅由于其超前性和预见性，更由于在审视与批评启蒙理念和现代性时所带出的西方思想家所阙如的中国传统观念，即一种天、地、物、人、我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一体和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而弥足珍贵。当前，系统阐发中国现代思想家的“启蒙反思”论说，将可为致思于人类未来走向的方兴未艾的国际性“启蒙反思”思潮提供某些启示和借鉴，也可为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提供趋利避害、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决策参考；当然，当中国现代思想家的“启蒙反思”论说在正面意义上得到阐发之时，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突破启蒙观念的牢笼而展现出新的面相，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目 录

代序：启蒙的吊诡与启蒙的反思	胡治洪	(1)
萧蕙父先生对启蒙的继承与超越	郭齐勇	(1)
晚清法律改革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	梁治平	(14)
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	汪 晖	(26)
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与“启蒙反思”	李维武	(75)
胡秋原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	田文军	(108)
“孝”与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李翔海	(121)
杜维明“启蒙反思”论述评	李翔海	(136)
论新理学视野下的人权、民主与法治思想	单 纯	(152)
反思与反省——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题外之思	丁为祥	(165)
“启蒙反思”的主体意识	龚建平	(190)
超越西化——论胡秋原的西方文化观及其意义	胡治洪	(208)
超越启蒙心态——杜维明“启蒙反思”论域述论	胡治洪	(228)
在儒学与儒教之间：港台新儒家与香港孔教学院 之关系述评	范瑞平 柳向忠	(244)
刘述先先生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姚才刚	(258)
胡秋原论近代文化危机及其超越	谢远笋	(274)

刘鉴泉对进化论以及西方文化的反思	庞雯予	(298)
教化与启蒙之别——一个诠释学的分析	景海峰	(329)
伽达默尔与启蒙主义	何卫平	(342)
重建维系人心的信仰系统	郭齐勇	(373)
启蒙反思三题	陈来	(378)
中西视域中的中国大学教育反思	甘阳	(383)
启蒙思想与文化重建	李景林	(400)
反思启蒙与理解宗教	单纯	(405)
“启蒙反思”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李翔海	(410)
启蒙与物质主义	卢风	(415)
论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平衡	姜明琪 (Aglaia Starostina)	(429)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学术研讨会 综述	徐 骏	(435)

萧蕙父先生对启蒙的继承与超越

郭齐勇

西方人文精神的远源是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义，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人文主义把人的肉体与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人们谓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摆脱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欲、情感，肯定物质的自然界。其后又经过 18 世纪德国的新人文主义，20 世纪的科学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诸思潮的发展。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再以下就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人认识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极致，物质讲到极致，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堕落，就必须回过头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存在主义反对人类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把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反对人们在与物、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真正的内在的主体性。现代社会视人如物，以驾驭机械的态度对待人。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符号、号码。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为一个非真实的存在。因此，当代西方的人文学

者所讲的人性，已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所讲的异于神性的人性，而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回到人与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①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这当然不是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的负面，这些负面已经过近代文化的洗礼；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即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物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探讨启蒙的辩证法，揭示了启蒙自身的悖谬，启蒙在“祛魅”的同时造就了新的神话统治，人类凭借启蒙运动提供的科技实现了统治主体的转换，人走到了前台，成为控制外在世界的主人，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身与心发生了异化。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并未停留在启蒙的批判上，他们并未放弃启蒙，而是为了拯救启蒙，即在批判启蒙的基础上进行拯救，如通过理性的复元，合理地使用理性，实现主客体的和解等。因此，他们的广义的启蒙辩证法就含有批判与拯救的双重意义及辩证逻辑意涵。^②

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学者来说，重要的是继承启蒙的原义，也即从自然、神权、专制政治下解放人，解放自我；及至 20 世纪末期，才把反思启蒙的话题提到议事日程。业师萧蓬父先生即是处在这一背景之下的。

一、萧先生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解读中包含了“启蒙反思”的意蕴

关于萧先生的“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内涵、意义与价值，

^① 参见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唐君毅全集》卷八，台湾学生书局 1988 年版，第 44~51 页。

^② 参见谢永康、侯振武《实现启蒙自身的启蒙——形而上学批判视域下的启蒙辩证法》，《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第 12~18 页。

陈来教授与高瑞泉教授的讨论极具启发性。^①

有的同志认为，今天思想界有关“启蒙反思”的论说与萧先生的“明清启蒙思潮”的论说是针锋相对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认为两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观或启蒙论说包含了“启蒙反思”的意蕴。萧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启蒙时代的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启蒙反思”的理论，而是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从健康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出发，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坚持启蒙论说，反对取消、解构启蒙的看法，不同意把启蒙心态视为“有问题的心态”。^②然而实际上，萧先生强调的“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启蒙”所能包括的。我在本文中特别要谈谈我本人过去忽略的方面，近年来我已开始重视全面地理解萧先生的启蒙论域。^③

首先，萧先生的启蒙观的要旨，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现代性的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的是中国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传统，他驳斥了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疏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也就蕴含了“启蒙反思”。

1987年，萧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也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

① 参见陈来《历史自觉和文化主体》，《读书》2008年第5期；高瑞泉《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萧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5期。这是2008年有关萧萧父先生思想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成果。

② 萧萧父《自序》，《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页。

③ 参见郭齐勇《萧萧父先生文选序》，《萧萧父文选·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文化接合点。这是目前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① 萧先生不希望继续陷入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之中。

他认为，所谓启蒙，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的启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体性，走别人的路。1982年，他在其名篇《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以设问方式开宗明义：“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② 萧先生思考的中心是在中国多种思想资源中寻找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作为接上现代化的基础或起点。他所寻找的是中华民族自我批判、自己走出蒙昧的16世纪泰州学派等新动向，特别是17世纪明末清初一大批思想家与文化人的思想异动。故他强调的是“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③ 他的关键性的思路是“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④ 与西方思想家视西方启蒙为绝对、普遍的立场，截然不同。

1986年，萧先生说：“特别是要意识到对外开放所含蕴的我们的民族要自我振兴在文化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历史责任。既要摆脱近代史上曾有过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之类的老框框，又要反对失去主体的自卑思想。正确的主体思想来自历史创造活动，来自对历史形成的文化现实及其发展的正确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既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又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消化了外来的文化因素……我们继续着17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正在更自觉、更深广也更有选择地吸取、消化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

① 萧萑父《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73页。

② 萧萑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1页。

③ 萧萑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5页。

④ 萧萑父《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57页。

新成就。如果我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把它们融会贯通，让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在中国‘聚宝’，经过重新创造再反馈出去，那将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①很明显，萧先生主张在宽容开放中不失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萧先生论证“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探索“中国式的思想启蒙道路的特点”。^②他特别重视“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学而强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消化西学，重建“中华文化主体”。^③在本土文化中，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那里，就孕育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胎儿。

晚年的萧先生特别指出“早期启蒙说”的深刻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生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作‘天生的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④

其次，萧先生的启蒙观，特重非西方民族与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之体认，批驳了西化派否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认识论的看法，批评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意涵。这恰好是“启蒙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

萧先生肯定“中国文化要走自己的路”与“寻根意识”，强调

① 萧萑父《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48页。

② 萧萑父《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60、61页。

③ 萧萑父《活水源头何处寻》，《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90~91页。

④ 萧萑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46、48、49页。

“‘无形的根’，那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真道理’，即具有普遍价值的民族精神，乃是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源头活水”；“西方文化的道路和模式却并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西方现代文化是欧美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个性很强的东西，尽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现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并不是错的。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问题，确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①

他说“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见解，即认为中国哲学注重伦理学，着重讲修身；而西方哲学才注重认识论，着重讲求知……应当突破欧洲近代实证论者的狭隘观点，看到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②这不仅是对冯契先生的肯定，也表明他自己的学术径路与工作重心。萧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曾下功夫研究了汉魏之际、明清之际的认识论问题。他很重视中国先哲“察类”、“明故”、“求理”的过程与特色，又重视辩证思维。他指出：“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辩证理性思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民族智慧中的辩证思维，既区别于印度，又不同于希腊，而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和逻辑发展……作为认识成果的辩证法，也同样表现为一系列范畴和规律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并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得到理论总结……历史上的辩证法的认识成果，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并非完全表现为哲学理论形态，而是以不同程度的抽象、多种形式的范畴表现于各种思想文化的史料之中”。^③他重视史家、兵家、农家、医家、天学、数学及政论、文艺评论和学术史观中的辩证智慧。

萧先生批评西化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对本土哲学智慧的漠视与曲解“到了近代实证科学思潮兴起并传入中国以后，一种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崭新医学及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

① 萧萐父《辨异·自主·寻根》，《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537页。

② 萧萐父《通观全过程，揭示规律性》，《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531页。

③ 萧萐父《〈中国辩证法史稿〉弁言及后记》，《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572~573页。

论开始拒斥传统的中医学，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被认为违反实证科学而陷入困境，《周易》也被看作充满神秘象数的一座迷宫而无人问津，中医与《周易》的会通关系渐趋疏远了。”“在中国，历史地形成了医易之间互相会通的文化传统。三才统一的宇宙模式，动态平衡的系统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范畴体系，乃是医易相通的逻辑基石。”^①他对古代医学与易学中蕴藏的有机整体、动态平衡、生命信息、生理节律等予以高度肯定。

对于气论与传统思维，对于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萧先生有很多发明，又特别发挥王船山诗化哲学与历史文化慧命，指出“船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船山诗化了的‘梦’，乃其人格美的艺术升华。”“船山之学，以史为归。……通过‘史’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绵延……”^②他对道教、禅宗等的思想方式与人的胸次、境界、性灵的关注，都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他对西方从16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从维柯到法国百科全书派，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塞等所持的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予以扬弃。^③以上表明，萧先生的启蒙论说，恰好超越了西方从启蒙时代到康德的启蒙论说，包容了也超越了今天“启蒙反思”的内容。

二、萧先生的“人论”超越了启蒙时代的“人的重新发现”

萧先生说“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

^① 萧萑父《〈周易会通精义〉序》，《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585~591页。

^② 萧萑父《船山人格美颂》，《吹沙二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424~427页。

^③ 参见萧萑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50页。